

谨以本文集纪念
著名语言学家、我国对比语言学科创始人、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
吕叔湘先生(1904—1998)百年诞辰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birth centenary of Professor Lü Shuxiang (1904 – 1998) ,
the well-known linguist , founder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in China ,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序

○ 赵世开

本书的编者之一王菊泉是吕叔湘先生的高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招收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的研究生,由吕叔湘任导师。当时有二三百人报名考试,最终录取了三名,他们是陈平、王菊泉和周焕常(后改名周流溪)。真正是百里挑一。名师出高徒,这三位学生后来都在语言学中做出了很多贡献。吕叔湘曾赞誉王菊泉做学问细心。从本书收集近十年来英汉对比研究的论文来看,王菊泉看得很仔细,挑选也很认真,充分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功力。

顺便说一下,当年组成他们三位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共五位:吕叔湘、许国璋、廖秋忠、范继淹和我。王菊泉的毕业论文是《英—汉限定词的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和其余两篇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如今上述五位答辩委员中有四位已经过世,只剩下了我一人。想到此,不胜感伤。若是他们还在,我认为这篇序应该由他们中的一位来写。我还想,他们如果看到王菊泉编出这么一本出色的论文集,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所谓的“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做学问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哪些是热门,哪些是冷门,哪些有发展,哪些已衰退,一句话就是现在的“行情”如何。这就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是要花功夫的。获得信息以后还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认真阅读并且用脑子来消化。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读书人安不下心来好好读书。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读语言学的书跟读小说不一样。看小说或其它闲书可以猫在沙发上翻开就看,读语言学的书只能坐在书桌边,把书翻开,边上还得准备笔和纸以便记录。先要像打太极拳一样思想必须“入静”,待入静后才能真正看进去。这其间除了自己思想要专注,还不能有干扰。一旦打断又得重新入静。再就是读书要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甚至翻来覆去耐心地读懂。这

擺

序

跟有的书可以采用“快速阅读法”可不一样。欲速则不达,读得似懂非懂可不行。读 Z. S. Harris 的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还得用笔在纸上计算。读书是蛮苦的,但也有乐趣。读书人不读书怎么行呢?本书的编者的确很耐心地读了那么多文献,真正是花了功夫用了心的。从这十年里那么多文献中精心挑选了 44 篇论文,就凭这一点我认为也该感谢编者了。

这本论文集向我们展示了近十年我国英汉对比研究的现状。从这个小窗户看,似乎方方面面都有人做。我个人认为,就微观而论(我把微观定义为“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书中都有所反映,然而结合语言的现象都比较少,缺乏成系统的对比研究。例如在语音方面,似乎很少有文章从物理、生理和心理的特性方面进行全面的对比。就宏观而论(我把宏观定义为“把语言放在时间、空间和社会中研究”),真正联系哲学、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作深入考察的文章也还不太多。由此看来,英汉对比研究还是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从量的方面考虑,现在作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过去多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对此感兴趣。

国内搞英汉对比研究的人似乎常常讨论三个问题:理论和应用,共性和个性,“两张皮”(指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的现象)。关于理论和应用的问题,我总觉得强调应用的人多,重视理论的人少。这可能跟我们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有关。记得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实用主义比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还要实用主义。不知此话可有道理?至于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强调个性(即注重“异”)的人多,而强调共性(即注重“同”)的人少。我们总喜欢谈“中国特色”和“汉语特点”,不大谈“人类的共性”和“语言的普遍性”,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关“两张皮”的现象,我感觉问题至今还存在。在学校里,中文系和外文系很少联合举行学术活动,往往是中文系的活动外文系不知道也不参加,外文系的活动则中文系不知道也不参加。至于跟研究其他民族语言的人的沟通就更少了。这种各自为政并关门搞研究的现象跟二十一世纪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向是很不合拍的。我想这种做法对英汉对比研究的发展极为不利。

发展一个学科关键在于有人去做,所以培养人才是基础。我国目前中文系和外文系培养的人才很难适应英汉对比专业的需要。作英汉对

比的研究,我认为英语要好,汉语要好,还要有语言学的知识和科学训练。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建议大学应该设立语言学系,至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还没有语言学系(华中师大和湖南大学外语学院设立了语言学系)这种情况很难适应语言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英汉对比的研究。我自己大学本科在外文系,研究生在中文系,深感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生物学、数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不够,工作起来总是力不从心。我国大学里文科课程的设置远远落后于各个学科发展的需要,毕业后要补的课太多,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能不能组织各科专家对课程设置进行科学论证?能不能对现在的教学水平进行客观的科学评估?不能只由个别人说了算。千万不能做误人子弟的事。英汉对比研究要有真正的进步必须培养一批有能力的人。另外,我还有一个印象,文科研究中集体的项目比理工科的少,多半是单干,这必然影响科研的成果。现代科研的特点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一个人很难完全适应。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项目,组织一个梯队,集体来完成。仅仅靠一个人关起门来作研究很难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语言学的需要。

学术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很幸运的是搞英汉对比研究的人有一个自己的组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这个学会每两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希望这类研讨会能继续下去。我认为研讨会不一定要有很多人参加,形式可以灵活些,有大型的,也可以有小型的(十多个人也行)。每次会要有一个主题,大家围绕主题进行认真的讨论。现在有一种现象,每次研讨会人很多,交的论文质量不高,类似“入场券”。会上一个人一个人地轮流念个几十分钟,真正的讨论不多。这种研讨会有点劳民伤财,在学术交流方面起的作用不大。讨论会上不要客气,要一针见血,直来直往,问题越多越好。这种会风值得提倡。中国人太讲究客气和面子,做学问最好不要来这一套。

英汉对比研究应该放在整个语言科学研究的大背景中。语言学的发展已经历了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五代,这五代语言学目前还并存着。随着脑科学的兴起,现在围绕人类大脑机制的研究日益昌盛,语言科学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上个世纪后期,美籍学者王士元曾提出过“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这一概念。前不久他曾利用生物学中的基因学说解释语言的起源。人类正在进一步了解人的自身,语言学也同样为了了解人的自身

进一步探索语言的生成和理解。我认为英汉对比的研究也同样是朝着这一目标在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相辅相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这本论文集向我们展示了近十年来英汉对比研究的现状。面对现实,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不足。一个聪明的学者往往善于看到并承认不足,进而去作新的尝试和探索。N. Chomsky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敢于五次修正自己的理论模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衷心期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将促使英汉对比研究向新的高度前进。最后,再一次感谢编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2004年7月5日于北京方庄

序

○ 杨自俭

王菊泉老友嘱我给他和郑立信编的文集写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了。一是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很感兴趣,二是因为我和菊泉有着诚挚的学术友情。我认识菊泉是1990年。1985—1989年我在讲授英汉语法修辞比较的过程中,收集选编了《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其中选了菊泉的三篇文章。从文章中知道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他是吕叔湘先生的关门弟子,深受吕先生影响,和吕先生有很深的感情。他待人谦和,严于律己,做事一丝不苟。记得文集清样看完的那天王益康社长请我和王菊泉吃饭,席间王社长提出应请吕先生为文集题词,于是我们商定,我以文集编者的身份,菊泉以学生的名义分别给吕先生写信,请他答应我们的请求,因此才有了吕先生那个著名的题词。吕先生的信和题词是这样写的:

菊泉弟:

7.31 信收悉。杨君要题词,实在有点为难。拟了几个,觉得下面这个还勉强可以,也不知道杨君愿不愿意要。近来我眼睛和手配合不好,写了几遍都不满意,我看不如用铅字排(仿宋体较好看,楷体也可以)。外国书也都是铅字排,没有用手写体的。署名如要手写的,另纸附上,其实也可以用铅字排。即问
暑安!

叔湘 8.3

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

署名(另附)也可排
铅字

擺

附

[注]在信的左边偏下空白处吕先生还写了如下的小字：“铅字用小四号或五号。位置在中间略偏上。”

最后我们尊重吕先生的意见,把文集题词排成了印刷体,署名排了手写体。吕先生这个题词已成了对比研究的指导思想,它使我和菊泉之间有了更多讨论的话题,我们都愿沿着吕先生指明的方向,共同做些促进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工作。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出版5年后,接着出版了《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这两本文集对我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交流了学术思想,联络了研究队伍,引领了学科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我建议菊泉主持选编第三本文集,因为从第二本出版至今已有9年的历史了。这9年英汉对比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的进展,分析一下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预测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和规划一下今后的主攻方向。要完成这个任务菊泉同志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英汉语基础好,对比研究有专攻,熟知这个领域的来龙去脉,做事又特别认真。菊泉和立信两位同志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文集的选编任务,从千余篇论文以及部分专著与论文集中精心筛选出44篇论文,分为理论和方法、语音、词汇和语义、语法、句群和语篇、修辞和语用、文字、文化、对比与应用等9部分编辑而成。并且下工夫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前言,不但对这9部分所收的文章逐篇进行了评述,而且从8个方面(详见前言)总结了近十年来学科所取得的进展和主要成就,同时还就与学科今后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西结合、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个性研究与共性研究问题。我相信这篇前言对未来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一定会起到指导作用。

审读文集的过程中和后来拜读前言时,我想得较多的是这个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我想在此借题发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理论建设问题,工程技术学科也不例外。一个学科开始可以没有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工程技术学科,但长期没有自己的理论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学科长期没有自己的理论,那它的独立存在和发展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影响。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一门自身理论建设滞后的学科。在国外它作为共时的研究方法(contrastive analysis)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近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从《马氏文通》算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有106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时间虽不长,但也有二十余年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为什么滞后呢?近期的理

论建设情况怎么样呢？下面就谈谈这两个问题。

员 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

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较长时间不被重视，一般是因为它的产生是从技术或方法开始的，而且长期被认为是一种工匠技术或是一种研究方法。实践者感到技术和方法的价值在于建立让人仿效的规范，用之能立刻见效又能传授下去。技术和方法的长期使用很容易使人满足于“做法”和“效果”之间的联系，如果效果很好，那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一般他们不去想为什么用这种“做法”而不用另一种“做法”，其规范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制约人的视野，干扰对事物观察的客观性，排斥对工作对象的科学描写与解释，甚至拒绝对其进行理论研究。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认知模式——直觉式感悟，这种认知模式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使用，所以不能立刻见效的理论当然就认为是无用的。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木匠、铁匠、泥瓦匠、理发师、乐师、司机、建筑工人等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大都是这种认知模式，他们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论问题一般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理论问题和他们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跟他们从事的工作与目前的利益几乎毫无关系。从我们熟悉的学科来看，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中国长期被认为只是一门工匠艺术，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翻译理论建设受到了关注，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翻译研究不是学科，没理论，或者说有理论也没用，其理由是这些理论不能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技巧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得意的理由是某某翻译家从没研究过翻译理论，但翻译的作品很好。他们把具有多种功能的理论曲解成只有一种功能的技巧。从他们写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满足于“做法”和“效果”之间的联系，而对关系到学科发展全局的范畴、理论命题和理论系统的研究毫无兴趣。我国的新闻学也和翻译学一样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一路走来，长期唱着“新闻无学”之歌。以这种观念对待学科理论建设怎么能不滞后呢？说到从研究方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学科，有典型意义的可以说是对比语言学。我们知道整个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历时的比较研究，到了20世纪初就有人针对历时比较研究方法的缺陷而提出了共时对比研究的方法，R. H. Robins(1967)在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中说：“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方面，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他（指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家或者

擴

序

隐含在论述中,或者不予理会,而索绪尔则把它们明确地表述出来。”英国语言学家 Henry Sweet 较早就喜欢共时的描写语言学研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后不久,欧洲也发表了一些全部或部分讨论共时语言学的著作。美国语言学家 Di Pietro 在 *Language Structures in Contrast* (1978) 一书中指出:“Many linguists of the Prague School became interested in contrastive analysis. One of the principal figures in that movement, Mathesius (1882 - 1945), wrote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Czech* in 1926.”显然这时 contrastive analysis 仍然是一种共时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学科。1941 年美国语言学家 B. L. Whorf 在他的 *Language and Logic* 一文中说,“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lassify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earth into genetic families, each having descent from a single precursor, and in tracing such developments through time. The result is calle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technology of thought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his plots the outstanding differences among tongues — in grammar, logic, and gener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在这儿 Whorf 第一次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同时还把它跟比较语言学做了比较,说明了其价值和特点。一直到 1957 年美国语言学家 R. Lado 出版了他的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对比语言学才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Lado 把它定位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a fairly new field of applied linguistics), 但是他的研究系统不是建立在对比语言学自己学科理论的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那么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一直到 1977 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和他次年招收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研究生,这个过程经历了 80 年;1992 年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出版标志着我国对比语言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学界学者大都把“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对比研究”这个术语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才逐步使用起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看待,而不是当作一个学科来研究,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研究语言的学者把它当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门学科。

那么对比语言学成了独立的学科以后为什么理论建设依然滞后呢?从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主要原因有 3 个:第一个是可借理论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比如开始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借助转换生成语言学,后来又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近些年来还借助了语用学、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Di Pietro (1978) 书中比较早

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As theories change, new avenues of contrast present themselves. If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in the theories themselves, these discrepancies will be painfully evident in application to contrastive analysis.”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比语言学是随着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第二个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期不够明确。从国外的研究来看,Whorf 只提出语言之间的“差异”(the outstanding differences)问题,没有论及语言之间的“共性”问题。之后的研究者虽然都说到“差异”和“共性”两个范畴,但大都强调“差异”,直到1981年波兰语言学家 J. Fisiak 在他的文章 *Some Introductory Notes Concerning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中才提出了两者在理论研究中同样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共性范畴”(universal category)问题。在国内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从《马氏文通》到1936年王力先生发表《中国语法学初探》,这是强调“共性”的阶段,对“差异”不够重视;从1936年到40年代末,则是强调“差异”的阶段,对“共性”研究重视不够;从40年代末到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这是一个过分强调“共性”的阶段,而忽视了对“差异”的研究。吕先生的这个演讲可以说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1977年以后虽然有了学科的意识,但从国内外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来看,主要倾向还是强调“差异”。1992年杨自俭发表《英汉对比研究管窥》,提出对比语言学应有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不应该只重视“差异”,呼吁重视“共性”问题;1994年他在《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建设》中明确提出了“异同并重”的观点。从过去10年国内外的情况来看,总的趋势是逐步在走向“差异”和“共性”并重的阶段。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除了语言之间的异同问题之外,还有个第二级目标问题,那就是造成“异和同”的根源问题。在西方虽然 Lado 1957年在他的那本著作中列专章讲了文化比较,而且提出了一个包括形式(form)、意义(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等内容的比较模式,但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没能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深入研究下去。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是一直没有被人关注,直到1990年才由吕叔湘先生明确提了出来,那就是他为《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所作的题词。吕先生这个题词高瞻远瞩,不但明确提出了对比研究的两级目标,而且指明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从而把对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三个原因是学科的性质长期不够明确。在西方多数研究者一直认为对比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到1980年 C. James 在学科性质上虽然承认有理论对比语言学,但他更倾向于把对比语言学归入应用语言学。在国内赵世开(1985)和刘宓

庆(1991)先生也是都认为对比语言学有应用研究也有理论研究,但他们也是倾向于把它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西方从1981年Fisiak开始,中国从1992年许余龙开始,对比语言学的性质才明确为: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有应用对比语言学,也有理论对比语言学。总之,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时间不明确,学科的性质长时间争论不止,又有其他理论可以借用,那么这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就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发展滞后。所以学科理论建设工作最关键的也是最先应该下大力研究解决的就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这个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

圆 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的状况

首先我们应有一个评价学科理论建设的标准,1999年11月我在上海翻译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了译学学科建设的标准:(1)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否清楚;(2)学科的性质是否明确;(3)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并且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4)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5)是否建立了本学科的方法论。此外还提出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对学科理论建设具有普遍性,因此可以用来评价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下面就按这个标准来考查一下该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

(员) 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问题。从前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吕先生的题词以前,国内外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之间的“同”和“异”,也就是“共性”和“个性”,而且强调主要是用共时描写的方法研究“异”,以此区别于比较语言学。随着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吕先生的题词发表以后,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吕先生的题词明确提出了对比研究的两级目标:异和同以及产生异同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两级目标就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二是认为用共时描写研究的“异”需要用历时研究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另外由于对比研究的目的不在只限于应用的范围,它应该而且必须有理论研究,因此过分强调“异”而忽视“同”就违背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和本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因为异同是相辅相成的。基于以上的认识才有了我们几经修改而成的下边这个定义:“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

支学科,它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主要任务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和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和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从上边的论述可知“同”和“异”是两个基本范畴,应该研究它们的外延与内涵,给予准确界定,以利构成逻辑系统。这方面的研究我知道不多,只能举例与提出问题供大家参照与思考。第一是吕先生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中讲到的三种情况:一种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是此一彼多或此多彼一,第三种是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在这三种情况中吕先生通过实例分析又提出同中之异、多对多不齐、第三种情况下的省略与重复。从中可知吕先生讲的都是“异”的问题。第二是 J. Fisiak(1981)对“同”的分析,他说:“Theoretical contrastive studies give an exhaustive account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wo or more languages, provide an adequate model for their comparison, and determine how and which elements are comparable, thus defining notions as 精粗异同,译名音韵,造字,精粗异同,译名音韵 etc.”在这段话中,Fisiak 不但提出了“异”和“同”两个范畴,还提出应界定“全等”(congruence)、“近似”(equivalence)、“对应”(correspondence)等次范畴。从中可知他讲的都是“同”的问题。第三是芬兰著名学者 A. Chesterman(1998)在他的 *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一书中对“同”的分析(注:本文所用汉语的“同”包括英语的 similarity, equivalence)。他先把 similarity 分成 similarity-as-trigger(引发相似)和 similarity-as-attribution(归属相似),前者描写从物质到心灵的认知过程,后者描写从心灵到物质的认知过程。然后指出:“She(Tamar Sovran, 1992) groups these items into various sub-domains representing types of similarity: repetition, copy, reconstruction,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the type-token rel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analogy.”Sovran 把 similarity 划分成 7 种类型,汉语译名依次可叫:重复物、复制物、仿造物、误认物(子像父)、型-例关系物(同样天气)、表征物(看似相同)、类比物(两国政策相似)。Chesterman 又把型-例关系物这一次类分成“发散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 from type to tokens)和“集中相似”(convergent similarity, from tokens to type)。对比研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中间项”(tertium comparationis, 简称 TC),这个范畴是个开放性的,它会随着人们对所比事物认识的深化逐渐扩大它的内涵。Chesterman 评述了 Krzeszowski(1990)把 TC 分化成的 7 种类型的“近似”(equivalence) 统计近似(statistical ~)、翻译近似(translation ~)、系统近似(system ~)、语义-句法近似(semanto-syntactic ~)、规则近似(rule ~)、实体近似

(substantive ~)、语用近似(pragmatic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异同”两个基本范畴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吕先生分解的是“异”,Fisiak和Chesterman分解的主要是“同”。关于同和异的关系问题我去年在给马秉义《英语词汇系统论》一书写序(《关于对比语言学中的共性问题》)中已谈过,这儿不再赘述。这个领域我们认为今后应着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把“同”和“异”都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分种类和等级两个系统进一步探讨,既要追求异同到底各有多少个种类,又要追求异同的各个种类又划分多少等级;二是要深入研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因为同和异都是很难分离的,而且同都是异中之同。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应用方面来说这项研究都极其重要,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三是要研究吕先生提出的二级目标即造成异同的根源。这个目标应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语言系统本身,要比较两种语言的历史,用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来解释语言的变异,不仅要比较语言的产生与演变,而且还要比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第二个是思维系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系统,不同的思维系统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这种认识方式的不同就是语言表达不同的认知基础,追根求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思维发生学。

(圆) 学科性质问题。认识学科的性质主要看研究对象和它在学科系统中的位置,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异同并重,因此它就不能只有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应该同时具有理论语言学的性质。它的上位学科是语言学,所以它是语言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学科。1992年11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学科分类与代码》(GB/13745~92),把对比语言学列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下属比较语言学(二级学科)下位的一个三级学科,跟它并列的三级学科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二者的关系真是上下位关系吗?从赵世开(1979,《浅谈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和胡壮麟(1998,《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动向》)对二者所做的比较来看,很难说明二者是上下位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

(猿) 范畴和理论系统问题。一个学科能不能真正独立,能不能为别的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援,关键在于它有没有形成逻辑系统的理论,而不是只有几个不成系统的概念。这种有逻辑系统的理论具体表现为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外延与内涵都界定清楚的分级的范畴,而且这些分级的范畴形成了逻辑系统,比如辩证思维基本范畴,它之下有相关且呈递进关系的三部分:A 客体逻辑范畴、B 主体逻辑范畴、C 主客体统一的逻辑范畴。

而这三部分之下又分别有 A 包括的 a1 实践、客体、主体 a2 质、量、度 a3 内容、形式、现象。B 包括的 b1 同一、差异、矛盾 b2 根据、条件、联系 b3 因果关系、相互关系、整体联系。C 包括的 c1 个别、一般、本质 c2 过程、系统、规律。用这个标准来看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情况怎么样呢？应该说许余龙（1992/2002）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基础理论方面，他除了研究并界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分类以外，还研究了可比性（comparability）、语料选择和研究程序问题。单就可比性的研究来说，他在吸收 James Fisiak, Ellis, Krzeszowski 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个包含层面（level）、层级（hierarchy）、对应（equivalence [注]许书中用的“对应”）等范畴的共同对比基础系统（tertium comparationis）。这个系统的下位包括语外和语内两个分系统，语外的下位又分物质实体、语言环境、交际情景三个子系统，语内的下位分形式、功能两个子系统，而形式和功能的下位又各分三个小系统（详见许著《对比语言学》第 37 页）。Chesterman 把 TC 分解为 7 种类型的“近似”，许余龙把 TC 分解为 9 种对比基础类型，下一步我们应把这两种划分加以比较，在分析其异同的基础上提高其范畴化和系统化的程度。范畴和理论系统的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首先是范畴的选择、确立与界定，同时关注、研究与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有机的逻辑系统。这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源）和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语言学的性质非常复杂，有生物性、社会性、心理性，还有技术性，但吕叔湘先生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它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正是因为它性质复杂，所以它跟许多学科有相关性，但相关的程度很不一样。卫志强（1992）在《当代跨学科语言学》中讲了跟语言学相关的 15 个学科领域，但没涉及对比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问题。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跟对比语言学关联较多的是翻译学和跨文化交际学（我叫它对比文化学）。语言学和许多学科与研究领域相关，对比语言学也是如此，但我们要研究跟它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似应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理论和应用方面，前者应包括音系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篇学、语用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因为它的理论研究要在这些学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后者主要有翻译学（包括机译）、对比文化学、双语教学和双语词典编纂等，因为它的研究成果要应用于这些学科。二是跟它有上位和并列关系的学科，那就是比较语言学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目标、方

法等方面都有着交叉、支撑、互补的关系。三是影响语言理解与选择的外部因素,主要在社会和心理两大领域,涉及的学科很多,但目前看我们应更多关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给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因为研究造成语言异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这些学科的成果。要把对比语言学跟它最相关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搞得比较清楚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需要许多学科的人通力合作,才能做好。希望下一个10年这个领域的研究能有明显的进展。

(缘) 本学科方法论问题。一个学科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也是学科是否真正独立的条件之一。但是一个学科的方法论建设却不应只关注这一个层面,还应该有哲学层面的、系统科学层面的、其他学科层面的。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体现在对比语言学中就是研究者和两种语言的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研究者和研究结果的关系以及协调理论研究和研究行为关系的规范与准则。这个层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关注不够,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提出的从人类共同范畴出发对比多种语言,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建立的那个完整的表达论体系,潘文国提出的对比研究要换一种眼光,从“地道”的汉语出发,还有重视理论建设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等。系统科学是标志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一种复杂性科学,它引导和启发人们关注各学科对本领域复杂性现象的研究,引导人们把研究范式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用它的整体观、结构观、环境观、功能观与演化观来研究对比语言学,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关系的对比研究,比如大小或者各小系统之间的关系,各系统和大小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关系,学科史的整体和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他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应该合理借用,Chomsky借用了心理学理论和代数演绎法,创立了转换生成语言学。要研究对比语言学的运行机制,就得借用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说到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科诞生以来已积累了不少有效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共时对比描写的方法。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定性研究很多,定量研究很少,描述性研究很多,解释性研究很少,形式化研究更少。可喜的是这几年方法论的建设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许余龙针对缺少定量研究,先学习了国外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从理论上比较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异同,依据本学科的特点探讨了定量篇章对比分析、语言对比实验和语言对比调查等三类实证性定量对比研究

方法,并身体力行,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英汉指示词语的可及性等问题,为方法论建设做出了一大贡献。沈家煊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做的解释性研究,严辰松所做的英汉词汇化对比研究,牛保义所做的英汉语法化对比研究,徐盛桓有关在中西比较诗学视角下开展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的论述等在方法论建设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开拓,值得倡导,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学习。

另外关于学科的理论与应用两部分分清界限、自成体系问题,在这几年的著作和文章中已有明显的进展,比如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和潘文国的《汉英语对比纲要》。2002年两书都做了修改和补充,许著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第1—7章和第10章为理论部分,讲了基础理论、5个分支学科(语音、词汇、语法、篇章、语用)的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第8—9章为应用部分,讲了对比分析在外语教学和翻译领域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从抽象程度、纵横方向、距实践远近等方面可以看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的区别。潘著是一部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著作,也可叫汉英对比语言学著作,它的结构不是按汉英语言学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分支学科的惯用系统来组织的,而是选取了汉语特征突出的语法特征、基本结构单位、句子结构、语序、虚词、话语组织法、语言心理等问题构成了该书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否科学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它不是那种理论和应用混杂的书,而是一本在理论上很有特色的汉英宏观对比研究的著作。

我们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某些进展,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研究队伍还太小,对理论的兴趣又不甚浓厚,因此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必须做更多的鼓动、评论与交流工作,以推动学科理论的深入研究。

杨自俭

2004年8月5日

记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攝

附